

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集部 · 王文成全书

(一)

李 雯瑶主编

目摇摇录

王文成全书卷一·····	员
语录一·····	员
传习录上·····	员
右曰仁所录·····	獭
王文成全书卷二·····	员
语录二·····	员
传习录中·····	员
答顾东桥书·····	员

王文成全书卷一

语录一

传习录上

先生于《大学》“格物”诸说，悉以旧本为正，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。爰始闻，而骇，既而疑，已而殚精竭思，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。然后知先生之说，若水之寒，若火之热，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。

先生明睿天授，然和乐坦易，不事边幅，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，又尝泛滥于词章，出入二氏之学，骤闻是说，皆目以为立异好奇，漫不省究；不知先生居夷三载，处困养静，精一之功，固已超入圣域，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。爰朝夕炙门下，但见先生之道，即之若易，而仰之愈高；见之若粗，而探之愈精；就之若近，而造之愈益无穷；十余年来，竟未能窥其藩篱。

世之君子，或与先生仅交一面，或犹未闻其声欬，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，而遽欲于立谈之间，传闻之说，臆断悬度，如之何其可得也。

从游之士，闻先生之孝，往往得一而遗二，见其牝牡骊黄，而弃其所谓千里者。故爰备录平日之所闻，私以示夫同志，相与考而正之，庶无负先生之教云。门人徐爰书。

爰问：“在‘亲民’，朱子为当作‘新民’；后章‘作新民’之文，似亦有据，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，亦有所据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作‘新民’之‘新’，是自新之民，与‘在新民’之‘新’不同，此岂足为据？‘作’字却与‘亲’字相对，然非亲字义。下面‘治国平天下’处，皆无‘新’字无发明，如云：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如保赤子；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’之类，皆是‘亲’字意，‘亲民’犹孟子‘亲亲仁民’之谓，亲之即仁之也。百姓不亲，舜使契为司徒，敬敷五教，所以亲之也。《尧典》‘克明峻德，’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；至‘平章协和，’便是亲民，但是明明德于天下。又如孔子言‘修己以安百姓，’修己便是明明德，安百姓便是亲民，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，说新民便觉偏了。”

爰问：“‘知止而后有定’，朱子以为‘事事物物皆有定理，’似与先生之说相戾？”

先生曰：“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，却是义外也；至善是心之本体，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；然亦未尝离却事物。本注所谓‘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’者得之。”

爰问：“至善只求诸心，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？”

先生曰：“心即理也，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乎？”爰曰：“如事父之孝、事君之忠、交友之信、治民之仁，其间有许多理在，恐亦不可不察？”先生叹曰：“此说之蔽久矣！岂一语所能悟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：且如事父不成，去父上求个孝的理；事君不成，去君上求个忠的理；交友治民不成，去友上、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。都只在此心，心即理也；此心无私欲之蔽，即是天理，不须外面添一分。以此纯乎天理之心，发之事父便是孝，发之事君便是忠，发

之交友、治民便是信与仁，只在此心去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。”

爰曰：“闻先生如此说，爰已觉有省悟处。但旧说缠于胸中，尚有未脱然者，如事父一事，其问温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，不亦须讲求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如何不讲求，只是有个头脑，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。就如讲求冬温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。讲求夏清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；只是讲求得此心，此心若无人欲，纯是天理，是个诚于孝亲的心，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，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；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，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。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，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，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。譬之树木，这诚孝的心便是根，许多条件便是枝叶，须先有根，然后有枝叶，不是先寻了枝叶，然后去种根。《礼记》言：‘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；有和气者，必有愉色；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。’须是有个深爱做根，便自然如此。”

郑朝朔问：“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？”

先生曰：“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，更于事物上怎生求？且试说几件看！”朝朔曰：“且如事亲，如何而为温清之节？如何而为奉养之宜？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，所以有学问思辩之功。”

先生曰：“若只是温清之节、奉养之宜，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，用得甚学问思辩？惟于温清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；奉养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。此则非有学问思辩之功，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。所以虽在圣人，犹加精

一之训，若只是那些仪节，求得是当，便谓至善，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，亦可谓之至善矣！”爰于是日又有省。

爰因未会先生“知行合一”之训，与宗贤、惟贤往复辩论，未能决，以问于先生。先生曰：“试举看？”

爰曰：“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、兄当弟者，却不能孝、不能弟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。”

先生曰：“此已被私欲隔断，不是知行的本体了。未有知而不行者；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，圣贤教人知行，正要复那本体，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。故《大学》指个真知行与人看，说‘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’。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；只见那好色时，已自好了，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；只闻那恶臭时，已自恶了，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。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，鼻中不曾闻得，便亦不甚恶，亦只是不曾知臭。就如称某人知孝，某人知弟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、行弟，方可称他知孝、知弟。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、弟的话，便可称为知孝、弟。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言知痛；知寒，必已自寒了；知饥，必已自饥了。知行如何分得开，此便是知行的本体，不曾有私意隔断的，圣人教人，必要是如此，方可谓之知，不然只是不曾知。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！如今苦苦定要说明知行做两个，是甚么意？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？若不知立言宗旨，只管说一个两个，亦有甚用？”

爰曰：“古人说知行做两个，亦是要人见个分晓。一行做知的功夫，一行做行的功夫，即功夫始有下落。”

先生曰：“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。某尝说知是行的主

意，行是知的功夫；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若会得时，只说一个知己自有行在；只说一个行己自有知在。古人所以即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，只为世间有一种人，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惟省察，也只是个冥行妄作，所以必说个知，方才行得是；又有一种人，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，全不肯着实躬行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，所以必说一个行，方才知得真。这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，若见得这个意时，即一言而足。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，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，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；故遂终身不行，亦遂终身不知，此不是小病痛，其来已非一日矣。”“某今说个‘知行合一，’正是对病的药；又不是某凿空杜撰。知行本体，原是如此，今若知得宗旨时，即说两个亦不妨，亦只是一个；若不会宗旨，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？只是闲说话。”

爱问：“昨闻先生‘止至善’之教，已觉功夫有用力处，但与朱子‘格物’之训，思之终不能合。”

先生：“格物是止至善之功；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。”

爱曰：“昨以先生之教，推之格物之说，似亦见得大略，但朱子之训，其于《书》之‘精一’，《论语》之‘博约’，《孟子》之‘尽心知性’，皆有所证据，以是未能释然。”

先生曰：“子夏笃信圣人，曾子反求诸己；笃信固亦是，然不如反求之切。今既不得于心，安可徇于旧闻，不求是当？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，至其不得于心处，亦何尝苟从？‘精一’、‘博约’、‘尽心’，本自与吾说吻合，但未之思耳！朱子格物之训，未免牵合附会，非其本旨。‘精’是

‘一’之功，‘博’是‘约’之功。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，此可一言而喻。尽心知性知天，是生知安行事；存心养性事天，是学知利行事；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，是困知勉行事。朱子错训格物，只为倒看了此意，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；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，如何做得？”

爱问：“尽心知性，何以为生知安行？”

先生曰：“性是心之体，天是性之原，尽心即是尽性，‘惟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。知天地之化育’。存心者，心有未尽也。知天如知州、知县之知，是自己分上事，已与天为一。事天如子之事父、臣之事君，须是恭敬奉承，然后能无失；尚与天为二，此便是圣贤之别。至于夭寿不贰其心，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，不可以穷通天寿之故，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，只去修身以俟命。见得穷通寿夭有个命在，我亦不必以此动心。事天虽与天为二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；俟命便是未曾见面，在此等候相似。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，有个困勉的意在；今却倒做了；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。”

爱曰：“昨闻先生之教，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。今闻此说，益无可疑。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，即是事字，皆从心上说。”

先生曰：“然身之主宰，便是心；心之所发，便是意；意之本体，便是知；意之所在，便是物。如意在于事亲，即事亲便是一物；意在于事君，即事君便是一物；意在于仁民、爱物，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；意在于视、听、言、动，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。所以某说‘无心外之理，无心外之物，’《中庸》言‘不诚无物，’《大学》‘明明德’之功，只是个诚意。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。”

先生又曰：“格物如孟子‘大人格君心’之‘格’。是去其心之不正，以全其本体之正。但意念所在，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，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，即是穷理；天理即是‘明德’，穷理即是‘明明德’。”

又曰：“知是心之本体，心自然会知。见父自然知孝，见兄自然知弟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，此便是良知，不假外求。若良知之发，更无私意障碍，即所谓‘充其恻隐之心，而仁不可胜用矣’。然在常人，不能无私意障碍，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，胜私复理。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，得以充塞流行，便是致其知。知致则意诚。”

爱问：“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，深思之未能得，略请开示”！

先生曰：“礼字即是理字。理之发现可见者，谓之文；文之隐微不可见者，谓之理，只是一物。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。要此心纯是天理，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。如发见于事亲时，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；发见于事君时，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；发见于处富贵、贫贱时，就在处富贵、贫贱上学存此天理；发见于处忠难、夷狄时，就在处患难、夷狄上学存此天理。至于作止语默，无处不然，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。这便是博学之于文，便是约礼的功夫。‘博文’即是‘惟精’，‘约礼’即是‘惟一’。”

爱问：“‘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。’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，此语似有弊？”先生曰：“然。心一也，未杂于人谓之道心；杂以人伪谓之心。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，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，初非有二心也。程子谓‘人心即人欲，道心即天理。’语若分析，而意实得之。今日：

‘道心为主，而人心听命。’是二心也。天理人欲不并立，安有天理为主，人欲又从而听命者？”

爰问文中子、韩退之。先生曰：“退之文人之雄耳，文中子贤儒也。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，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。”

爰问：“何以有拟经之失？”

先生曰：“拟经恐未可尽非。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，与拟经如何？”

爰曰：“世儒著述，近名之意不无，然期以明道；拟经纯若为名。”

先生曰：“著述以明道，亦何所效法？”

曰：“孔子删述六经，以明道也。”

先生曰：“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？”爰曰：“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，拟经似徒拟其迹，恐于道无补？”先生曰：“子以明道者，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？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谄谄于世也？天下之大乱，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使道明于天下，则六经不必述；删述“六经”，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、周公，其间言《易》如连山、归藏之属，纷纷籍籍，不知其几？《易》道大乱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，知其说之将无纪极；于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说而赞之，以为惟此为得其宗，于是纷纷之说尽废，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。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皆然，《书》自‘典’、‘谟’以后，《诗》自‘二南’以降，如‘九丘’、‘八索’一切淫哇逸荡之词，盖不知其几千百篇？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名物度数，至是亦不可胜穷；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，然后其说始废。如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

《乐》中，孔子何尝加一语，今之《礼记》诸说，皆后儒附会而成，已非孔子之旧。至于《春秋》，虽称孔子作之，其实皆鲁史旧文，所谓笔者笔其旧，所谓削者削其繁，是有减无增。孔子述六经，惧繁文之乱天下，惟简之而不得；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，非以文教之也。“春秋以后，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乱，始皇焚书得罪，是出于私意，又不合焚《六经》，若当时志在明道，其诸反经判理之说，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自秦汉以降，文又日盛，若欲尽去之，断不能去；只宜取法孔子，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，则其诸怪悖之说，亦宜渐渐自废。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？某切深有取于其事，以为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“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实衰，人出己见，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誉，徒以乱天下之聪明，涂天下之耳目，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，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、反朴还淳之行，是皆著述者有以求之。”

爱曰：“著述亦有不可缺者，如《春秋》一经，若无《左传》，恐亦难晓？”

先生曰：“《春秋》必待传而后明，是歇后谜语矣；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？《左传》多是鲁史旧文，若《春秋》须此而后明，孔子何必削之？”爱曰：“伊川亦云：‘传是案，经是断’；如书弑某君，伐某国，若不明其事，恐亦难断？”先生曰：“伊川此言，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，未得圣人作经之意；如书弑某君，即弑君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？征伐当自天子出，书伐国，即伐国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？圣人述《六经》，只是要正人心，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。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，则当言之。或因人请

问，各随分量而说，亦不肯多道，恐人专求之言语。故曰：‘予欲无言’！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，又安肯详以示人？是长乱导奸也。故孟子云：‘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。’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，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，纯是一片功利的心，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，如何思量得通？”因叹曰：“此非达天德者，未易与言此也。”

又曰：“孔子云：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’孟子云：‘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吾于武、成取二三策而已’。孔子删书，于唐虞夏四、五百年间，不过数篇，岂更无一事？而所述止此，圣人之意可知矣。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，后儒却只要添上。”

爱曰：“圣人作经，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，如五伯以下事，圣人不欲详以示人，则诚然矣。至尧舜以前事，如何略少见？”

先生曰：“羲黄之世，其事阔疏，传之者鲜矣，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，略无文采的气象。此便是太古之治，非后世可及。”

爱曰：“如《三坟》之类，亦有传者，孔子何以删之？”

先生曰：“纵有传者，亦于世变渐非所宜。风气益开，文采日胜，至于周末，虽欲变以夏商之俗，已不可挽，况唐虞乎？又况羲黄之世乎？然其治不同，其道则一。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，于文武则宪章之。文武之法，即是尧舜之道，但因时致治，其设施政令，已自不同。即夏商事业，施之于周，已有不合；故周公思兼三王，其有不合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；况太古之治，岂复能得？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。”

又曰：“专事无为，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，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，即是佛老的学术；因时致治，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，要以功利之心行之，即是伯者以下事业；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，只是讲得个伯术。”

又曰：“唐虞以上之治，后世不可复也，略之可也；三代以下之治，所世不可法也，削之可也；惟三代之治可行。然而世之论三代者，不明其本，而徒事其末，则亦不可复矣。”

爰曰：“先儒论《六经》，以《春秋》为史。史专记事，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？”

先生曰：“以事言，谓之史；以道言，谓之经。事即道，道即事。《春秋》亦经，五经亦史；《易》是包羲氏之史，《书》是尧舜以下史，《礼》、《乐》是三代史。其事同，其道同，安有所谓异？”

又曰：“五经亦只是史，史以明善恶，示训戒。善可为训者，特存其迹以示法；恶可为戒者，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。”

爰曰：“存其迹以示法，亦是存天理之本；然削其事以杜奸，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圣人作经，固无非是此意，然又不必泥着文句。”爰又问：“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，何独于《诗》而不删郑卫？先儒谓‘恶者，可以惩创人之逸志。’然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《诗》非孔门之旧本矣。孔子云：‘放郑声，郑声淫。’又曰：‘恶郑声之乱雅乐也，郑卫之音，亡国之音也。’此是孔门家法。孔子所定三百篇，皆所谓雅乐，皆

可奏之郊庙，奏之乡党，皆所以宣畅和平，涵泳德性，移风易俗，安得有此，是长淫导奸矣。此必秦火之后，世儒附会，以足三百篇之数；盖淫泆之词，世俗多所喜传，如今闾巷皆然，‘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，’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。”

爰因旧说汨没，始闻先生之教，实是骇愕不定，无入头处；其后闻之既久，渐知反身实践，然后始信先生之学，为孔门嫡传；舍是皆傍蹊小径，断港绝河矣。

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；明善是诚身的工夫；穷理是尽性的功夫；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；博文是约礼的工夫；惟精是惟一的工夫；诸如此类，始皆落落难合，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。”

【译文】

关于《大学》中“格物”说的种种解释，先生完全以“旧本”为标准，也就是从前士子们所讲的舛错甚多的那种版本吧。对此，我开始是惊奇，接着是迷惑，后来经过仔细思考，认真研究，比较优劣，问难请教，才深知先生的学说真象水之清寒绵长、火之温暖跃动，一定会传续后世，以待圣人出世而启蒙万代的。

先生天资灵睿智慧，而人品又和善坦荡、平易可近，生活随便自然，不修边幅。那些曾见过先生小时候放荡不羁、豪迈不凡，吟风弄月，写下不少诗词文章，而又出入于佛、道二教的人们，突然听说先生所创立的学说思想，都以为先生是有意标新立异，属于随意涉猎不求甚解之类。可他们那里知道先生孤居南国边垂，独处困境、悉心静养，清苦荒芜三年不乱心志，已超凡入圣，步入精醇中和之境，修得宁静

精一之功，而身列圣贤之行。作为弟子，我与先生朝夕相处，多得教诲，深知先生的学术思想，乍接触时好象很容易，可细思量、深仰望愈显高妙，初看时好象粗浅，可细讨论、深琢磨方觉得精深；学习理解时好象近在眼前，可真正掌握完善起来是那么不可穷尽。跟随先生十多年，细想起来对于先生思想轮廓竟然没能有个明确把握。

当今的正人君子，有的只与先生有一面之交，有的就根本没聆听过先生的教诲，也有的怀着嫉妒和不服的心情曾与先生有过三言两论的短谈。仅凭这些站着的短谈、无根的道听途说和随意的主观臆断，怎么能理解先生的学术宗旨、思想精髓呢？而那些从游的弟子们，对于先生的孝行学旨，往往是记住的少而遗忘的多，抓住皮毛的多而理解精髓的少。就好比只记得马的雄雌和黑黄颜色，却不知道马能日行千里一样。所以我将先生平日的教诲记录下来，私下里拿出来与师友同仁探讨共勉，相互纠正补充，力争符合先生原意，而勿辜负先生的教诲。此由先生弟子徐爱敬书。

徐爱问：“‘在亲民’，朱熹把它当作‘新民’讲，并在后来的文章中也这样，读起来似乎也有根有据。先生则认为应该从旧本的解释当作‘亲民’讲，这也有根据吗？”

先生答道：“当作‘新民’的‘新’字使是‘民之自新’的‘新’与‘在新民’中的‘新’字含意不同，这怎能当作充足的理由呢？‘作’字与‘亲’字相对应，但绝不是‘亲’字。于接下来的‘治国、平天下’的内容相联系，当作‘新’字讲，乃毫无发明创新之意。比如讲：‘君子善待贤士英才而亲近那些值得亲近的人，百姓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从世俗的利益中受益，这样象养育婴儿那样来对待自己的

国民。喜欢百姓所喜欢的，讨厌百姓所厌恶的，这才是国民百姓的父母官。’如此之类都是‘亲’字的含义。‘亲民’正如孟子讲的‘亲爱自己的亲人，仁爱自己的百姓’。‘亲’就是‘仁’，都是爱的意思。百姓中缺乏亲仁之爱，舜便让契作司徒仔细制定五教之礼以教化百姓。《尧典》中讲‘克明峻德’，实际就是让家中崇尚道德、使百姓亲和九族。至于‘平章协和’之句，就是让社会崇尚道德，使天下百姓亲仁友爱。还有如孔子所讲：‘修己以安百姓’一句，‘修己’就是崇尚道德，修养自身。‘安百姓’就是对百姓亲和仁爱，要爱护百姓。所以说，讲‘亲民’就兼顾到了教与养双重含意，而讲‘新民’就难免有偏失之处。”

徐爱问：“朱子讲‘知止而后有定’，认为是指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确定之理，他的这种解释好象与先生的说法有抵触。”

先生答道：“在纷繁杂乱的事物上寻找最高的善，那是向外求义。最高之善就是心之本体。只有在道德修养方面进入‘至精至一’的境地，才能获得最高之善。当然，这一过程也绝不会与客观的事物相脱节。这就是书本中讲的，充分发挥、挖掘心中固有天理，而又不夹杂丝毫个人私欲的人才能获得最高之善。”

徐爱问：“如果最高之善只在心中求取，那恐怕就不能穷尽天下事物之理。”

先生答道：“本心就是天理。世界上那有独立于人心之外而存在的事物和道理呢。”

徐爱问：“诸如侍奉父母的孝心，服务君王的忠心，交往朋友的信誉，治理百姓的仁心等，这其中都蕴涵着许多道

理，恐怕也是不能不去仔细体察的对象。”

先生感叹道：“这种错误说法流传已久，怎能一两句就使你醒悟呢。今只就你所提到的说几句：比如说不能孝侍父亲，就去父亲身上寻找进孝的道理，不能忠辅君王，而要到君王身上寻求进忠的道理，不能诚信地交朋结友和仁爱地治理百姓，却要到朋友身上和百姓身上寻找诚信与仁爱的道理等，这就头足倒置了。种种道理都在人的心中，人心自具天理，人心就是天理。人心只要没被私欲蒙蔽，天理自然明耀显露，这是丝毫不需要从外界吸收增添的。用这种饱含纯净天理的心灵去侍奉父亲，就一定能尽进孝心，去辅佐君王，就一定能尽进忠心，去交朋结友、治理百姓，就一定会使人感到诚信、仁爱之心。所以，只要在个体的心中细下去除私欲、存养天理的功夫，就能做到孝、忠、信、仁。”

徐爱说：“听了先生这番话，弟子已有所省悟。但许多旧的说法仍然缠绕心中，使我无法一时解脱出来，因而心中疑团难消、苦闷犹存。比如说侍奉父亲这件事，其中有寒暖关照、晨昏问安等等具体事项要做，不知这些是否也该留心关注？”

先生答道：“怎么能不留心关注呢？只是要有个清醒的头脑，要在个体的心中就去除私欲、存养天理上留心关注。比如冬天关心父母的温暖，夏天关心父母的清凉，只是完全地按照心中的孝道要求去做，守持谨慎，唯恐心中夹杂丝毫个人私欲，这样留心关注，在个体本心上探究，那么自己心里便无丝毫个人杂念，满心只有纯净天理，自然是孝顺亲人的心。严冬到来，你自然会考虑到父母的寒冷而寻找个使他们温暖的道理。酷暑到来时，你自然会考虑到父母的炎热而